

# 距今七千年前的我国新石器遗存研究

裴安平

早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就有了“新石器早期”遗存被发现的报导。但是,7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大抵只是处在积累与客观介绍资料的阶段。

70年代中期,河姆渡、磁山、裴李岗等一批重要遗址相继发掘,使新石器早期研究的课题出现了重大转机。此后,重要发现,新鲜资料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在学术界的研究课目中,偏重谱系的局面开始突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开拓。

由于新石器早期遗存的研究,涉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涉及农业、家畜饲养、聚落、制陶、纺织工艺的发生与兴起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此,自7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这时期的研究,同探索文明的起源一道,开始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二大重要课题。

本文将要讨论的范围,主要涉及距今七千年左右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些遗存并非都真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是处在现阶段各自区域文化谱系的早期位置上,通过它们可以为许多问题的分析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考虑到这些新石器遗存的碳素年代许多都超出了达曼校正表的范围,故本文所采用的 $^{14}\text{C}$ 年代数据一律未经校正,并以5730年作为其半衰期。

## 一、七千年以前新石器遗存的分布与特征

距今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现阶段的发现近乎于侧“T”字形集中分布在

我国东部第三级阶梯内,并在第二级阶梯中部顺渭河河谷向西延伸。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征,这些遗存大致可归纳成四大文化带:华南文化带、长江中、下游文化带、黄河中、下游文化带、北方文化带。

### (一) 华南文化带

华南7千年前的新石器遗存较多发现于广东、广西两省区,重要遗址有柳州鲤鱼嘴①、兰家村②、桂林甑皮岩③、南宁豹子头④、扶绥江西岸⑤、横县西津⑥、防城亚答山⑦、英德仙佛岩等⑧。其中豹子头 $^{14}\text{C}$ 年代距今10735—9625年,甑皮岩11310—7580年,江西岸9385—8950年。如剔除数据中水生介壳类样品的偏老成分,它们的年代落在1万—7.5千年之间。

由于各种原因,华南的工作相对薄弱,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欠成熟,尤其是新石器早期,至今还在按遗址自然地貌类型排比资料。因此,这里的讨论难免粗阔。

现有报导,华南1万年以后的新石器遗址已散布在石灰岩洞穴、河旁阶地、海滨岗丘等多种地貌中。一些阶地遗址形成有早期聚落,如桂平大塘城⑨,但所有这些遗址均只见火坑,而未有营建遗迹。

在生产工具的构成中,磨制石器不断增加,但打制石器始终占有较多数量。此外,还有骨角器,个别地点还有打制细小燧石器。这里,农业工具的分化已趋明朗,有斧、铤、磨盘、杵等。

采集与渔猎是经济生活的主要组成部

分, 各类遗址都大量存在水生介壳类堆积。动物遗存的鉴定表明: 家畜饲养已经开始, 种类有猪, 也可能有牛或羊。至于栽培作物, 目前无明确证据。有人认为华南及东南亚一带可能在世界上最早培植芋、薯等无性繁殖的块茎类植物, 而水稻则可能是长江流域, 甚至黄河流域影响的结果。事实上, 以华南的自然条件及普通野生稻的分布, 其水稻栽培史不应晚于更北的区域。

陶器普遍存在, 共有的特征是质地粗劣, 夹砂或蚌末, 颜色以红或灰褐色居多, 造型简单, 流行罐类等圜底器。值得注意的是, 器壁内部凹凸不平, 上薄下厚, 有的底竟达2.8cm。这些现象当可视为器物制作经历二个步骤的指示: 首先将底部挤压捏塑成型, 然后在上面再贴筑泥片完成整器。经测定, 甑皮岩陶器烧成温度680℃, 豹子头800℃。器表装饰多绳纹, 个别挂有红色陶衣。

## （二）长江中、下游文化带

长江中、下游文化带主要由中游与下游二个不同的文化区构成。自80年代初以来, 长江中游地区追寻新石器早期遗存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相继发掘的遗址已达十多处。更重要的是, 洞庭湖西北地区已成熟地勾划出了距今9—6千年内新石器遗存的基本序列: 以澧县彭头山遗址⑩(距今9100±120、8200±120)代表的一类遗存, 可称为“彭头山文化”; 以石门皂市下层⑪(距今7210—6920年)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可称为“皂市下层文化”。湖北鄂西的“早期”遗存均可归属其中。宜都城背溪⑫、枝城北⑬等为“彭头山文化”, 宜都金子山⑭、孙家河⑮等为“皂市下层文化”。关于这二种文化内部的区域类型。现在也有了初步迹象, 不过, 本文将不涉及此类问题。

在长江下游, 7千年以前的遗存主要有, 宁绍平原的余姚河姆渡早期遗存⑯, 太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早期遗存⑰。

据已有资料, 无论长江中、下游, 这一时期的遗址都集中在古代湖沼平原至山地间的交接地带。彭头山所处低岗即是洞庭湖盆地与武陵山余脉间的澧阳平原, 河姆渡遗址的现代地貌, 及文化层孢粉分析和动物种群的生态习性亦证实有相似的自然环境。

彭头山时期, 原始聚落已经形成。彭头山遗址现存面积近万平方米, 并有较长的居住时间。其下层显露的残存居室、灰坑及墓葬表示了一定的布局规律。大型居室面积约30平方米, 房基底部铺垫黄砂土, 柱洞还采取防潮措施。墓葬与灰坑位于居室周围。一次葬与二次葬随器物组合有别, 前者随装饰品, 后者随日用陶器。

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 小型燧石器亦较多, 型制有薄片与刮削器等。磨制工具数量与种类皆少。不过, 遗址所出石棒、管、珠一类装饰物, 不仅数量多, 且磨制精细, 形态规整, 一面或两面对穿孔, 最长的近2厘米。可见那时石器的磨制工艺已经成熟, 但作用方向尚未真正转移到工具的制作。彭头山文化很少发现骨、木器, 其原因与这里酸性土壤的腐蚀有关。

经济生活的重大事件首推水稻的种植。笔者83年在枝城北遗址, 曾采集到满布碳化稻壳的陶片与红烧土块。88年发掘彭头山遗址, 夹有碳化稻壳的陶器及红烧土块又再度出现。这些稻作遗存的存在, 不仅证实了长江中游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禾谷类作物的地区之一, 更在于说明了类似水稻栽培这类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与兴起应有广泛而深刻的基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活动能量、人口数量, 任何考验人类能力的巨大进步, 只可能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 经过较长的时间, 不断摸索、交流、总结, 而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区域共同促成的。当然, 这里的发现还需通过鉴定来确认。但西亚作物栽培历史的阶段性, 河姆渡稻作农业的成熟性都会有助于认识这里发现的意义。彭头山

文化还发现有家畜饲养的遗存，水牛就是其中一种。尽管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与家畜饲养，但生产工具的组合仍反映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

彭头山文化的陶器大部分外红内黑。红色表层厚约1毫米，质细呈粉状，似陶衣包裹器身，有的能直接与胎面剥落。据观察，黑色陶胎并非完全人为掺入植物残骸所致，也与陶土来源有关，遗址周围存在的泥炭堆积就此供给了极重要的线索。这里，陶器制作的步骤与华南同期类似，器物口沿歪斜起伏，内壁凹凸不平。底厚于口部二至三倍。小型及形态简单的器物均直接捏塑成型。烧制火候尚未测定，但陶质比较疏松。器物造型以圜底为特征，主要类别有深腹釜、小口双耳罐、盘、支座。外部装饰多绳纹，兼有刻划、戳印、镂孔、花边与磨光。

与彭头山文化比较，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河姆渡、罗家角等遗存各方面都留下了显著进步的标记。

长江中游，这时已出现烧土结构的居室。下游，河姆渡、罗家角则利用榫卯结构营造了杆栏式建筑。自此，适应南方水网地带潮湿环境的居住方式已成熟定型。

在生产工具方面，磨制石器大型化、专业化、正规化趋势明显。刃部不再是重点施磨部位，通体磨光、棱角分明、因功能而设计刃部特征的石器已批量出现。不过，骨木器仍以其取材制作便利，宜于湖沼土壤耕作而占居工具首位。此外，洞庭湖地区细小燧石器还在继续沿用。

农业的地位这时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河姆渡数量巨大的稻作遗存就是明证。与农业并行发展的是家畜饲养业的扩大，已有猪、狗、牛、羊等不同种类。但这时家畜饲养尚未对农业形成真正直接的依存关系，而且在农业有剩余产品之前，这种关系也不会明朗。我国新石器时代以猪下颌骨标榜财富多寡现象的

出现，恰与阶级分化年代相近的事实，正是对上述认识的佐证。根据河姆渡的资料，采集与渔猎当时依然是人类食物的重要补充来源。

这时期陶器制作与造型的特点是，胎壁趋薄，厚度均匀，器型较规整，开始流行平底器、圈足器，并出现个体造型复杂，转折起伏部位甚多的突出风格。彩陶已经成熟，有红、白、黑三色，或白衣红彩，或红衣黑彩，并有动植物纹样。关于制作工艺，比较前段有很大不同但泥条盘筑与慢轮修整技术的迹象还不十分清楚。

### （三）黄河中、下游文化带

黄河流域距今七千年前的代表性遗存有中上游地区的老官台文化<sup>⑧</sup>，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sup>⑨</sup>、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sup>⑩</sup>，它们分别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的渭河平原与河谷，黄河冲积扇与华北平原间的中介地带，泰山周围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sup>14</sup>C测定，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比其它二者更早。

裴李岗遗址聚落达2万平方米，墓区与住地分开。磁山遗址更发现众多粮窖<sup>⑪</sup>，居住区与食物储藏区各有其所。典型居室是半地穴式，地面修整或夹有料礓石等掺和料。

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还有少量典型细石器工艺制品。石器多磨制，大型化、专业化特征明显。并以铲、斧、镰、磨盘、磨棒构成组合，少见镑、凿。

在经济生活中，农业已具相当规模，据推算，磁山窖穴储粟竟达10万斤以上。家畜饲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猪、狗、牛、鸡、羊等种类都已发现。不过，据动物骨骼及碳化果实的鉴定显示，那里人类食物的来源仍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次之外，渔猎与采集仍占有重要地位。

制陶工艺的重要发现是横穴式陶窑，它指示已从露天堆烧进入到稳定正规的生产阶段。关于陶器的制作，由于可资比较的仅有

仰韶文化等晚一阶段的遗存，故现有记叙以揭露原始性为多，尤其是近年泥片贴塑法的认识，更使这种倾向得以加强。对此，更多客观地评价是必要的。在那里，器物形态已有了圜底、平底、三足、圈足等多种类别，装饰以绳纹为主，其中裴李岗、磁山所见曲折篦点纹颇具特色。彩陶也已初见端倪，个别器物饰有红色宽带。

#### （四）北方文化带

北方地区距今七千年以前的面貌正日渐明朗。在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距今7240年的兴隆洼文化已被发现<sup>②</sup>。其南沿可能伸展到河北北部，东北沿可能进入吉林境内。

由于资料所限，兴隆洼文化的面貌尚不十分清楚，这里只能依据遗址发掘简报扼要介绍其特点。

兴隆洼遗址规模很大，面积达3万平方米，四周围沟环绕，居室排列井然。建筑结构为半地穴式，未见门道，地面原土夯实而成。出土的工具以大型打制石器为主，兼有磨制石器、细石器工艺制品与骨器等。当中石锄、铲、磨盘、磨棒等应与农业生产有关，而骨鱼镖、嵌粘小石片的骨梗石刃鱼镖等应与渔猎相联系。以工具之构成和动物骨骼鉴定，参考稍晚时期沈阳新乐下层文化的资料，兴隆洼文化经济生活当有了农业的存在，并以黍为种植作物，至于它与渔猎的关系，很可能是并驾齐驱。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普遍胎壁厚重，且采用了泥圈套接捏合成器的技术。器形种类简单，多筒形罐与钵，流行之字形曲折纹样，未见彩陶。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距今一万年或更早，中国历史在东部多种地貌类型区域已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无论是这个时代的发生或发展，农业和其它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发明创造，都不是从孤立的氛围中产生的，而是以大范围的整体进步作为必要前提和条

件。同时，各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从一开始也促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比它的前身更五彩斑斓的景象。

## 二、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分野

在我国，关于区域性文化遗存分期序列的讨论一直比较活跃，而就新石器整个历史的阶段划分却相对沉默。正在普遍使用的“早期”、“晚期”的二分方案，或早、中、晚期的三分方案，事实上更多的只是反映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成绩。既缺少专门的论证，也很难说具备严格的历史意义。显然，以往实际资料的局限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新石器早期文化追寻成果的积累，这个问题初步有了深入分析的可能。这里，将要着重讨论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分野。

关于我国新石器历史早、中期的划分，以现有资料提供的线索，可以考虑把距今7500年左右作为年代界线。由此往前至1万或更早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跨度，往后至5千年左右是中期的范围。

早期典型代表首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的彭头山文化，华南距今7500年以前的遗存也应归属在内。中期则宜细分前后段，距今7千年左右的遗存属前段，而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大溪文化、红山文化晚期以前、马家浜文化等大体属后段。

以上划分的具体依据，现予整理如下。

（一）虽然已经出现了水稻栽培与家畜饲养，但早期的发展规模十分有限。在彭头山文化中，农业器具的数量很少，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磨制石器个体小。相反，打制石器的数量较多。器型与农业无缘，并有大量用作刮削的细小燧石器。这种构成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占有主导地位。就稻作与家畜遗存而言，发现也并非特别普遍。而且稻作

本身，以民族学资料 and 工具种类推测，当处在早期生荒火耕阶段。彭头山文化以后的遗存，农业与家畜养饲的进步显而易见。河姆渡第四层堆积的稻谷、谷壳、秆、叶等，厚20—50 cm，最厚达1米，若以此推算稻谷总量应在10万斤以上。家畜骨骼在这里也相当可观，破碎的猪骨与牙齿几乎到处都有，用牛肩胛骨制作的骨耜数量惊人。也许以河姆渡的材料作为生产性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标志，或因孤例而失之偏颇。那么，甌山的发现则应有助于消除疑虑。有人根据80个窖穴的粮食残迹推算，实际储量也应在10万斤以上。长江与黄河流域均在大致相同阶段发现近乎等同的粮食储存，这正是暗示了原始农业由此开始了大的发展高潮，并标志着人类在支配自然过程中出现了重大进步。

(二) 生产性经济的发展往往以工具的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高为基础。河姆渡骨耜使用量之大，甌山、裴李岗大型石铲之多，不仅是适宜自然环境的产品，而是耕作制度已转变为熟荒耜或锄耕的证据。此外，这一阶段磨制生产工具大型化、专业化、正规化趋势已经开始。在洞庭湖地区，皂市下层文化磨制石器的种类有了斧、镑、凿等。在长江下游，罗家角下层，磨制镑、凿器型更显规范，并有宽、窄刃之别，以利不同功用。在黄河流域，甌山、裴李岗所见斧、铲、镰及磨盘、磨棒等，构成系列组合，生产、收割、加工用具配套。当然，无需隐晦的是，在这些遗存的石质工具中，打制石器仍占相当数量。即使磨制工具也还多见琢磨兼施，磨制局部的现象。与晚于它们的遗存比较，原始性相当突出。然而，衡量石质工具的发展，磨制程度只具有量的规定性，而更重要的标准应当是它们的组合与适用范围、总体性能。概而言之，上述遗存磨制石器的大型化意味着在生产中作用的强化、专业化意味着作用范围的扩大，造型的正规化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因此，石器制作中的某

些原始瑕疵掩盖不了这时已经发端的进步，更何况这一进步的特质能与晚期遗存联系在一起。

(三) 就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较晚阶段建筑形式的考察表明，我国南北方的典型居住形态与流行样式均成熟于距今7千年以前。皂市下层文化，居室地面与四壁均被烧烤<sup>②</sup>，整幢建筑类似一座红色陶屋。在长江下游，河姆渡的杆栏式居室，因大量使用榫卯结构也表现了这种营造技术的成熟。烧烤地面与四壁的技术和杆栏式建筑此后被推广至中国境内的许多地区，特别是长江及其整个南中国区域。在黄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这时期富于特色的半地穴式与后期仰韶文化所出几同出一辙，而地面铺填料礓石更开新石器中、晚期乃至青铜时代居住面加工工艺的先河。

(四) 以往关于陶器制作工艺、造型、纹饰的原始性，大都成为了距今7千年左右的遗存归属早期阶段的证据。然而，彭头山文化的出现使得那种认识有了修正的必要。在彭头山文化及华南的同期遗存中，小型与形态简单的陶器大部捏压直接成型，大型器物底部也用类似技法，腹上部普遍采用泥片贴塑。这时期，器物造型简单，多圜底，一般口部无沿。装饰以通体绳纹为主，泥质外表层与加固胎壁防堵渗漏有关，纯粹非实用性的纹样少。与彭头山时期比较，晚期遗存在制陶方面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在器物造型中较多地采用了泥圈套接技术，并暗示有泥条（或泥片）盘筑法出现的可能。皂市下层文化器物形态复杂，壁面转折起伏处骤然增多，同一器物往往有数种乃至十数种不同样式。突出的例子是平底、鼓腹、亚腰、折肩双耳罐。河姆渡的高颈、折肩、折沿、敛口釜等亦属此类。此外，器物群的组合这时新添了平底器、圈足器、带流器等，除袋足器之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大类都已出现。从个体造型与类

群的上述变化，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种比前期更先进，更利于发挥的工艺技术，那么，人类创作的自由度就不会表达得如此鲜明。据报导，北方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手制，将泥圈套接捏合成器”，还“由一些陶器底部的残断痕迹观察，壁与底的接法似将器底的下端套在器底的外缘后捏合而成”。在长江中游，类似按部位分制后拼接的现象同样存在，圈足与盘、肩与腹、口沿与腹等都如此。此外，这里一些器物内壁，隐隐约约还可触摸到凸凹带的水平位移，在残断面上可观察到纵向的波状起伏。诸如此类的例证较清晰地表明了进步的轨迹。在泥片贴塑与泥条盘筑法之间，存在一个工艺上的中间过渡环节，它具体表现为器物按部位分制拼接，这种技术或可通称为泥圈套接术，从这里出发到泥条（片）盘筑法的产生应该不远。

第二，制陶术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陶窑。裴李岗文化所见横穴式，后来普遍发现于仰韶文化。陶窑的出现标志着露天堆烧阶段的完结，正规窑烧阶段的开始，它有利于烧成温度，烧成质量的提高。据测定裴李岗文化陶器烧成温度在 $830^{\circ}\text{C}$ — $950^{\circ}\text{C}$ 。目前，长江流域尚未见到这时期的窑迹。但罗家角第四层的某些“夹炭灰黑陶，质地坚硬，其强度都超过现代机制砖瓦，估计烧成温度在 $850^{\circ}\text{C}$ — $900^{\circ}\text{C}$ 之间”，“白陶质地比所有其他陶片都坚实，估计烧成温度在 $950^{\circ}\text{C}$ — $1000^{\circ}\text{C}$ 之间”<sup>②</sup>。由此推测，其烧制技术当不会落在裴李岗之后。

第三，以装饰为主要目的的纹样大量使用。在皂市下层，弦纹、划纹、戳印、镂孔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居器物的醒目部位。更有意义的是，彩陶工艺与表现手法已经成熟。后来彩陶的巨大发展总体上只是数量的增加与纹饰题材的开拓。

上述制陶方面的种种进步，很显然，并非只是早期技术的简单延续或某种程度的熟

能生巧，而是工艺与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五）以现有资料，华南、长江中、下游，大致相当彭头山文化阶段尚未发现纺轮制品，而晚一阶段，长江、黄河流域的发现则不在少数。尤其是河姆渡还在木具中辨认出了织布腰机上的横木杆，作纺织纬刀用的木匕，据此有人推测<sup>③</sup>，“已有原始的织机应不成问题。”这样，人类纺织技术在7千年前后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概括人类在经济形态、生产工具、建筑方式、制陶工艺、纺织工艺等五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整个过程中，彭头山文化代表的早期遗存与后续者之间的历史界面及阶段性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即距今约7500年以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生与发展期；以后，是它的初步繁荣期与繁荣期。

不过，参考华南新石器已有年代数据，以及彭头山文化在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可以说，它也只是早期中的偏晚形态。

### 三、两河流域在七千年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的轴心地位

当距今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近似侧“T”字形布局出现在中国东部大陆，并开始步入初步繁荣期时，其它周围地区，诸如兰州以西的甘青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内蒙西部、云贵地区，也就是中国地形上的第三阶梯和第二阶梯中除渭河河谷向西延伸的部分，至今尚未发现相当东部中期前段的遗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里存在一段历史空白。但现有材料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里新石器的发生发展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总体上可能按距离远近依次晚于东部。同时，在那些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中，与东部有联系的内容往往占着突出地位。这无疑反证了东部对西部地带的影

在河套地区，影响甚至包含直接输入的意义。作为这种影响的积极成果，农业在有条件的地区相继出现。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地点独自发展的可能性。如云南，有人认为它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之一<sup>②</sup>。

虽然现阶段我国东部新石器遗存的最早年代存在由南往北依次晚近的趋向，可是，据此推测这个时代的发生也有类似现象则为时过早。事实上，现在所有各种遗存，时代性特征都是共存的。早期，华南、长江中游、河姆渡第四层下部，陶器普遍上薄下厚；中早期，各地工具可见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琢磨兼施。陶器一改早期作风，胎壁厚薄均等，出现彩陶，流行宽带。此外，农业已得到普遍发展。诸如此类因素，均表现这些地区性遗存有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同时，各地还以自身特点强烈的陶器器物群暗示，在此之前，它们都已经历了较长发展，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显然，它们的关系又应该是一种平行发展关系。但是，承认以上事实和关系，实质是承认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文化的源流不同，并进而给予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以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但这并非就认为它们的进展速度具有齐头并进的性质。

综合评价中国东部距今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可以发现由长江、黄河组成的两河流域是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轴心。

由于相邻近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四大文化带中，长江与华南、黄河与北方分别构成了特点不同的南北两大区。

长江与华南基本上应被视为我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它们制作的陶三足器明显少于黄河流域、炊煮以圜底器为主。在石制品中镂孔的个体数量较多。洞庭湖西北流行的打制盘状器、细小燧石器、器口镂孔的作风皆见于华南。可是，华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那里，新石器时代的发生并不晚于其它地区，而当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已懂得在居室

建筑中采用防潮技术，并以实物坐实稻作农业已存在的时候，它的营建遗迹至今未曾露面，农业更多的也只是理论上的推导。当彭头山文化的陶器已开始明确地表达不同作用的时候，它陶器的数量与种类也嫌过少。由此可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华南的发展是缓慢的。

黄河流域与北方文化带在当时也构成了我国最早的旱地农业区，它们共同以半地穴建筑为居住形式，在工具中普遍包含了细石器制品，陶器均可见深腹的筒形罐或缸，“之”字形纹饰流行。不过，以现有资料要比较双方的发展程度尚有一定困难，但联系新乐文化小珠山遗存等稍晚类型分析，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的规模较黄河流域要小，狩猎所占比重较黄河流域为大。此外，北方地区磨制石器的数量、加工精度，陶器的种类均有逊色于黄河流域之处。

由于发展的程度各有不同，长江与黄河流域分别成为了南北方的杰出代表，并在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内形成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接触地带。显然，在这里，交往的层次与内容都将有别于任何其它两个地区，由此而对各自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也是巨大的。长江与黄河流域在七千年前农业、建筑、制陶、纺织、工具等众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如何不会是孤立发展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两河流域中，长江流域的某些先进因素确有令人惊异之处，在彭头山文化时期，陶器表面即敷有保护层——原始陶衣。至后一阶段，彩陶技艺成熟，既有多种颜色，又有不同纹样。在三足器与双耳器的制作中，足与耳同本体的联接还采用了榫印结构。河姆渡木构建筑的营造，尤其是燕尾榫、带梢钉的榫、削出企口的木板等，均显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外，河姆渡还有薏仁米、生漆制品、象牙雕刻、木雕、玉器、白陶等，更是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已进入十分活跃的状态。

态。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并不亚于黄河流域，更可能在许多方面对历史有重要贡献。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各种遗存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当时各自形成的优势特点往往难以简单类比。另一方面，当时文化遗存的活动能量还远不如晚期遗存，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它们对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七千年以前，中国东部并未在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将某一地区的某种文化再推到“核心”的位置上。

#### 四、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在诸多环境因素中，气候给人类影响十分突出。当它与具体的地形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就更为明显。

古气候学的专门研究表明：晚始新世——更新世初发生的喜马拉雅运动，导致青藏高原大幅度抬升，形成了中国东高西低的三级阶级状地貌格局。从此，中国气候受东亚季风影响范围广大，并呈现出南北冷暖对峙，东西干湿分异的总体态势。又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的区域性与时间性也非常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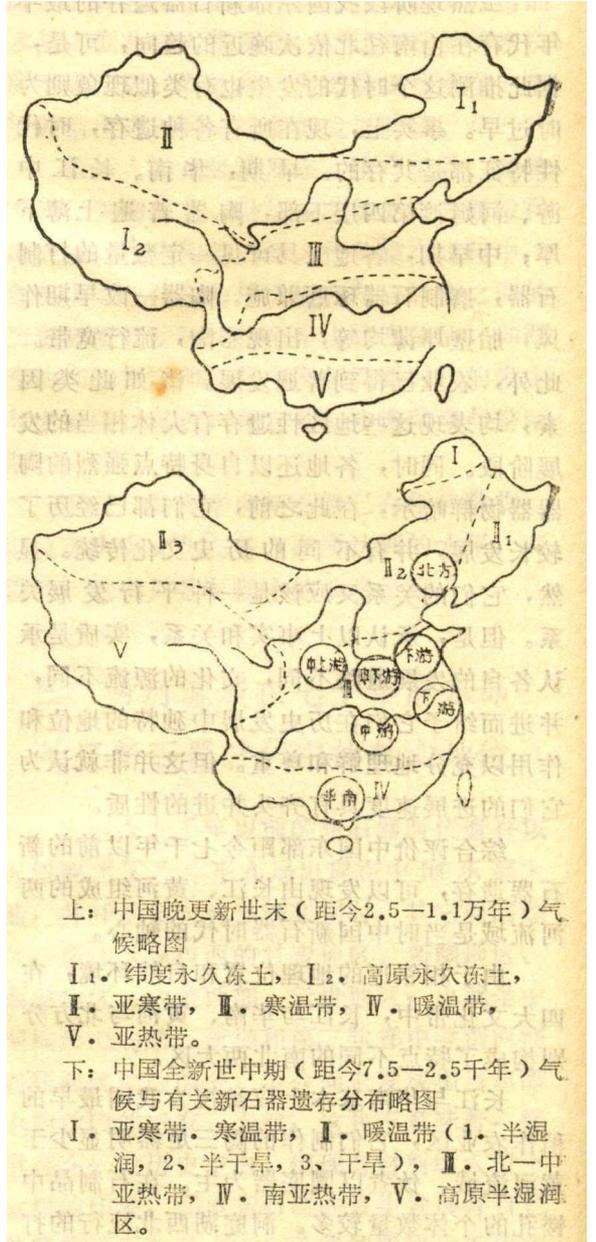
这就是本章考虑环境因素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生与发展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此，有必要首先简要追索一下前期的气候和人类活动的概况。

(一) 晚更新世末期(距今2.5—1.1万年)气候与人类活动

晚更新世末是中国近10万年来最干冷的气候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大部份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气温下降幅度大，并由北向南依次递减。在东部、北纬

42°以北，年均温-11—12℃。北纬39—34°或更南，寒温带气候降临、气温下降7—8℃。黄土高原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更显干冷。长江流域年均温约5—12℃。接近现代河北、辽宁，属暖温带气候。亚热带气候此刻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图上)。



面对寒冷气候的降临，人类活动较之以前具有如下新的特点。

第一，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以往普遍的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生活面临危机。人

类摄取食物的战略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采集与狩猎活动普遍强化。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业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强化作用的结果。显然，环境的变化，不仅会改变采集、狩猎的内容，而且还会促使人类朝驯化野生动植物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渔猎的地位迅速上升。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这时期出现的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就是这一变化的证明。很可能，这类遗存的经济是狩猎、渔猎并重。在华南、大量介壳类堆积进入遗址显示了它变化的区域特点。广东阳春独石仔<sup>⑦</sup>上中下三层介壳堆积不断增多的趋势，反映了经济活动由采集、狩猎转向采集、渔猎的过程。长江中游洞庭湖西缘一带，近年的调查发现也表露了类似的迹象。

第二，与经济生活的变化相适应，这时期的工具也有鲜明的时代性。石质工具普遍细化就是显著特点，无论南北大型打制石器的个体重量倾向减轻。在黄河以北及我国整个第二级阶梯的大部分地区，细石器大为流行。在长江以南，一批新式用具产生，其中有盘状器、穿孔石器、刃口磨制的切割器等，但不见细石器。

第三，概括前面两方面分析中不同经济生活和文化内涵的遗存，大致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南北差异，而东西区别不清楚。关于那个时代现在一般都归属在“中石器”的范畴中。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生大致就是从以上自然与文化背景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因具有优越于其它地区的自然条件。华南，也许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二) 全新世早期(距今1.1—0.75万年)气候与人类活动。

与全球气候基本同步，中国全新世早期的气候开始转暖，并表现出由南往北，自东向西逐步扩张的趋势。

在辽南一带，气候由前期的寒带气候回升为中——暖温带气候。华北平原中、北部

为中——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往西为半旱气候。长江流域气温也在回升，但仍比现代低 $1^{\circ}$ — $2^{\circ}$ 。华南亚热带气候向北稍有扩张。整个中国基本处于温凉阶段。

气候转暖，以及东部温度明显高于西部，有利于新石器时代在东部地区相继发生，并突破了前期文化南北分野的格局，形成了东西区别的局面。又由于气候普遍温凉，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渔猎经济，在人类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作用显赫，无论在哪个地区，可以说它都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人类定居聚落的形成，在中国，也不是以农业的发展为主要基础，或以发展农业为前提。华南这时期河旁阶地与海滨岗丘遗址的发现，以及它们具有与洞穴相似的地层堆积物和工具，恰恰证实了采集、渔猎经济由洞穴向其它地貌类型遗址的延伸，在洞庭湖周围，此刻，人类已从旧石器晚期湖旁丘陵的高岗步入湖沼平原中的低岗，并形成聚落。如此举动，既缩短了渔猎的距离，又朝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前进。在黄河及北方地带，这时期的情况尚不清楚，但那种气候本身也就决定了农业的规模，更何况其前期就以狩猎和渔猎并重为经济特点。虽然气候转暖有利于农业，但采集的进步更快。总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是农业发展的必要前提、新石器早期是农业的初步阶段。

(三) 中全新世(距今0.75—0.25万年)气候与人类活动

中全新世是全球性的高温期(大西洋期)，是第四纪气候历史中距现代最近的一次重大增温事件。中国大陆的气候与环境均处在近万年来的最适宜状态，年均温比现代高 $4^{\circ}$ C— $5^{\circ}$ C，降水量多数百毫米。其中辽南升为暖温带，相当现代秦岭、淮河以北。北亚热带扩张到黄河中游地区，长江流域为中亚热带，华南为南亚热带与热带(图下)。

气候的大幅度升温，促成了中国大陆新

石器中前期文化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

首先，在东部早期的农业区内，农业开始摆脱温凉气候的羁绊，初步进入一个大的发展高峰期，长江与黄河流域更以其农业在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标志了人类完全有能力支配自然历史的开端。与此同时，家畜饲养、制陶、纺织、艺术、磨制石器、建筑都获得了重要成就，为后来新石器文化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随着农业的发展，定居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各个地区性遗存的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存也显著增多。在黄河流域，农业聚落顺渭河河谷已上溯至甘肃东部。长江三峡地区，以及湘中也出现了同期遗存。显然，在这种新的自然条件下，我国境内凡条件适宜的地区均可能发生农业遗存，尤其是第二阶梯内那些地势较平坦，水利资源丰沛的区域。而在不太适宜农业的区域则可能存在或以定居聚落，磨制石器、陶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不过，早期即已形成的梯级结构并不因它们的存在而消失，东西间的差异是自然历史促成的。任何文化的平行关系并不能扭转或双方日趋接近，或差距愈演愈烈的发展导向。以自然条件大范围改善为前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从中期以后选择了前一条道路。

第三，东部地区两河流域的轴心地位开始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的中间性质发挥了作用。从地理位置方面观察，两河流域处在现代中国疆域的中间位置，也处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间位置。从环境方面观察，它的中间性质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但是，这里所涉及的环境更主要是就它向人类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条件，在新石器时代这种条件又具体表现在对农业的影响。概而言之，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既劣于华南，又优于北方。仅就旱地农业来说，黄河流域走在北方地区前面这不足为怪。在这里，环境因素的作用比较单纯。但是，就稻

作农业而言，环境作用就比较复杂。现代种植籼稻、粳稻的纬度分布表明，距今1.1—0.75万年期间，长江流域的气候并不特别有利于栽培籼稻，而在此之前的气候甚至从根本上就影响了普通野生稻的存在。因此，根据近2.5万年的气候演化风史，华南应该属于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可是，那里的农业迹象是如此模糊。以致引起了人们对它在水稻起源中地位的怀疑。追索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把环境作用的二重性联系起来考虑。那里稳定丰富的自然食物资源一方面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较理想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将人类的经济活动长期约束在采集、渔猎的圈子里，从而阻滞了农业的速度。由此可见，两河流域环境的中间性质，人类在这里支配自然的原动力与劳作产出量均有别于其它。应当指出的是，环境作用往往还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不同时期作用的因素不尽相同。在新石器早期，只要条件相宜的地区都会发生或可能发生农业；新石器中期，尽管农业在各地呈上升趋势，但潜在的自然条件却使相互间的规模显出了差距。无论长江流域沃野千里的湖沼平原，黄河流域的渭河平原，山区与平原的中介地带，还是鲁中南与华南的低山丘陵区，定居的生活条件下都可能于相似阶段步入农业的发生期，但后来森林覆盖面小，土壤肥沃且易于耕作，又不必频繁迁涉住地以求得新垦地的区域，其农业的进步速度和规模就会表现出相应的优势。正因此，两河流域轴心地位的形成是从距今七千年左右开始的。它们不仅以其发达的农业表现了这个地位的存在，同时也构成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接触地带，以及勾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巨大纽带。这种轴心地位的形成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虽然，人类的历史活动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完全受自然环境的支配。但上述分析表明，时代愈早环境作用愈明

显。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世与发展的基本结构，众多特点，实际均可追寻到晚更新世末以来环境的重大变迁。这也就是说，那种结构，那些特点都包含了较多的自然成分，并与新石器晚期以后，人类发展逐渐带来更多的自主性或社会因素形成鲜明对比。

### 主要参考文献

- 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 2、《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 3、赵锡文等《古气候学》，中国地质大学

### 注 释

- ① 《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83年9期
- ② 《广西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83年7期
- ③ 《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76年3期
- ④—⑥ 《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75年5期
- ⑦ 《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61年12期
- ⑧ 《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61年11期
- ⑨ 《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87年11期

- ⑩ 《湖南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10月
- ⑪ 《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86年1期
- ⑫—⑮ 《宜都县城背溪、枝城北、花庙堤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 ⑯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78年1期
- ⑰ 《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81年
- ⑱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65年1期
- ⑲ 《裴李岗文化》专刊
- ⑳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84年2期
- ㉑ 《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84年1期  
《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77年6期
- ㉒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85年10期
- ㉓ 《湖南临澧胡家屋场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 ㉔ 《罗家角陶片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81年
- ㉕ 《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 ㉖ 《亚洲稻的起源和稻作圈的构成》，《农业考古》88年2期
- ㉗ 《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82年5期

（上接160页）

### 注 释

- ① 黄纲正：《长沙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长沙史志通讯》1986年第3期
- ② 张朋川：《中国装饰纹样简史》，《图案》1985年第2期
- ③、④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
- ⑤、⑦ 牟永抗：《绍兴306号越墓刍议》，《文物》1984年第1期
- ⑥ 日本《博物馆》第306号（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81年3月
- ⑧ 严文明：《〈鸕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 ⑨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 ⑩ 《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 ⑪ 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⑫ 赵振才：《甲骨文殁与图腾柱》，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
- ⑬ 周晓陆：《子遗拾零——汉族地区某些上古民俗残留》，江苏省考古学、博物馆学会编《文物通讯》1954年4—5期（合刊）
- ⑭ 刘亮：《凤雏村名探源——从甲骨文看周人对凤的崇拜》，《文物》1986年第1期
- ⑮ 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文物》1989年第3期